

## 《伊斯兰文化散论》题记\*

丁俊

**内容提要**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是世界上历史悠久、影响广远的为数不多的几大文化体系之一，在人类文明史上发挥过承前启后、沟通东西的历史作用。对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研究历来是国际学术界的重要课题，进入 21 世纪，更是愈来愈受到东西方各国学术界的广泛重视。我国对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研究不但历史久远，而且成绩突出。但是与对西方文化的研究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存在诸多的问题，尚未建立起相应的学科体系。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文化研究体系，是 21 世纪中国学术界的一项重要任务。

**关键词** 《伊斯兰文化散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研究

**作者简介** 丁俊，博士，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甘肃兰州 730030）

**Abstract** Arab-Islamic cultur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ultures in the world, and it had linked up the west and the east, played a historic role in the history of human beings' civilizations. So the Islamic studies have always been the main subjects in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ircles. As is known to all, the Islamic studies in China not only had a long history, but also had some great achievements. Compared with our studies about the western culture, however, the Islamic studies still has a long way to go, and the subjects system of studies is not formed as yet. Therefore, to form a Chinese Islamic studies system is an important work for Chinese scholars in 21<sup>st</sup> century.

**Key Words** <Discourses on Islamic Culture>; Islamic Studies

### —

伊斯兰文化是世界穆斯林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文化，伊斯兰教是伊斯兰文化的核心价值观，阿拉伯语是伊斯兰文化最主要的学术媒介。由于这种文化具有鲜明的阿拉伯特征，故又称“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伊斯兰文化最初（公元 7 世纪初）以阿拉伯人作为主要载体而肇始于阿拉伯半岛，而后不断东渐西扩，走向世界，成为几个世纪中全世界的主流文化之一，拥有长达五百多年的黄金时期。伊斯兰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几大文化体系之一，在世界文明史上发挥了承前启后、沟通东西的历史作用，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伊斯兰文化至今仍有着旺盛的生命力，主导着众多的伊斯兰国家，也影响着世界思潮。今天，世界上有 50 多个伊斯兰国家，有 10 多亿穆斯林。伊斯兰文化很早就传入中国，与中华文化有着漫长的交往历程。我国有回、维吾尔等 10 个少数民族的

人民信仰伊斯兰教，他们对中华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

对伊斯兰文化的研究，历来是各国学术界的重要课题。我国关于伊斯兰教及伊斯兰文化的考察和研究有很长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唐朝。唐人杜环所撰《经行记》就比较准确地介绍了当时西亚各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和宗教特别是伊斯兰教的情况。这一重要文献虽已散佚，但从杜佑《通典·边防典》引录的 1510 字的佚文片段中不难看出，《经行记》关于伊斯兰教（大食法）的记叙相当具体和准确，如关于伊斯兰教“认主独一”的基本信仰，其中讲道：“不拜国王父母之尊，不信鬼神，祀天而已”；关于伊斯兰教的礼拜、斋戒、聚礼等宗教功修以及穆斯林饮食起居等生活习俗也有具体记述：“无问贵贱，一日五时礼天。食肉作斋，以杀生为功德”，“其俗每七日一假，不买卖”，“又有礼堂，容数万人。每七日，王出礼拜，登高坐为众说法，曰：‘人生甚难，天道不易。奸非劫窃，细行谩言，安己危人，欺贫虐贱，有一于此，罪莫大焉……’”，“断饮酒，禁音乐”，“不食猪狗驴马等肉”，“不食自死肉及宿肉”，“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法唯从宽，葬为

\* 本文是作者为《伊斯兰文化散论》所写的题记，该书即将由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6 年 6 月出版。

从俭”<sup>1</sup>等等。这些记述所以较为客观准确,是因为作者有长时间的实地考察,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这是我国史料对伊斯兰文化最早、最正确的记载。

至宋、元时期,伊斯兰教及伊斯兰文化对中国来说已不是一种陌生的域外文化。由于这时期政治格局的剧变、军事活动的频繁及商业交往的活跃,造成中外人员的大量流动,大批阿拉伯、波斯商人、士兵、工匠等或为贸易,或随军,纷纷来华,许多穆斯林以“蕃客”身份定居中国,积久成群,逐渐形成相对集中的居住区“蕃坊”,进而逐渐“华化”,在广州、泉州、扬州、杭州等沿海城市及长安、北京等大都市都建立起清真寺和公共墓地。及至元代,穆斯林的足迹几乎遍及全国,故《明史》有“元时回回遍天下”之说。中华文化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在这时期也有了更为广泛的接触和交流,汉唐以来开辟的海陆“丝绸之路”持续繁荣,中国的印刷、造纸、制瓷、纺织等先进技术借阿拉伯而西传,远至欧洲;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大范围东渐,伊斯兰教及阿拉伯穆斯林相对先进的科技文化和独特的人文科学不断传入中国,涉及宗教、哲学、文学、历史、地理、天文、历法、医学、数学、建筑、军事等许多领域,仅元代秘书监收藏的“回回书籍”就达242部之多。<sup>2</sup>元代著名航海家汪大渊还曾两度远涉重洋(1328~1332,1334~1339),穿行阿拉伯海和红海,远至今日索马里、摩洛哥等地,并撰有《岛夷志略》一书,记述了当时阿拉伯地区的情形和中阿交流状况。

明清时期,我国对伊斯兰文化的介绍和研究有了新的进展和起色,特别值得称道的有两个方面:一是陕西胡登洲(1522~1579)先师开创出“经堂教育”模式,从此改变了伊斯兰文化研习领域“经文匮乏,学人寥落,既传译之不明,复阐明之无自”<sup>3</sup>的局面。“经堂教育”的开展,使被称为“天方之学”的伊斯兰文化的研习活动在我国得以长期延续,内容涉及宗教、哲学、语言(阿拉伯语、波斯语)、文学、历史、地理、天文、历法等诸多领域。“经堂教育”还培养和造就出一代代精通阿拉伯语、波斯语并对伊斯兰文化造诣颇深的著名经师,为伊斯兰

教在中国的传播和中伊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这种研习活动仅局限于清真寺经堂内,且大多以口授方式进行,并没有留下重要的文字成果。二是“以儒诠经”活动的开展。以王岱舆(约1584~1670)、马注(1640~1711)、刘智(约1655~1745)等为代表的一批“回儒”,学贯中外,博通四教(伊、儒、释、道),致力于“用儒文传西学”,著书立说,“本韩柳欧苏之笔,发清真奥妙之典”,<sup>4</sup>借用大量儒释道(特别是儒)的术语,以典雅的汉语阐发伊斯兰教义,介绍和研究伊斯兰文化。王岱舆的《正教真诠》《清真大学》,马注的《清真指南》,刘智的《天方性礼》《天方典礼》《天方至圣实录》等,都是这方面很有分量的代表性著作。

“以儒诠经”活动充分吸纳宋明理学,着力构建“回儒一体”的思想体系,认为“回儒两教,道本同源,初无二理”。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进行比较研究,开展文明对话,以期达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和而不同的境界。只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所限,使得这种文明对话的努力和尝试并未引起主流学界的重视。然而,“以儒诠经”活动在中国学术史、思想史上理应占有重要的位置,其意义和价值直到今天才被学界有识之士所称道。例如,当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杜维明先生就认为,王岱舆、刘智等人的工作不啻是思想史上惊天动地的大事,因为在17世纪之前,伊斯兰文化最具原创性的论著均是阿拉伯语或波斯语文体,而王、刘等人竟成功地使古代汉语也成为阐发伊斯兰神学思想的工具,且更具哲学意味。杜先生还将刘智等人与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作了比较,认为中国和西方学界实际上都没有认识到在17世纪还有比利玛窦在中外文化研究方面更有贡献的人,那就是刘智。刘智在哲学和神学领域的建树远高于利玛窦,利玛窦企图宰割和消解宋明理学,使其回到先秦,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侵犯,极具侵略性。这一点可以从他写给梵蒂冈的密信中看出来;而刘智等则不同,他们是中国人的,是中国穆斯林学者,对儒学重在吸收和消化而非割裂,做到了视阈的融合,特别是对宋明理学的理解十分透彻,绝不亚于17世纪的任何一位汉族学

宛耀宾总主编:《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264~265页。

李兴华等:《中国伊斯兰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00页。

同上,第505~506页。

杨怀中、余振贵主编:《伊斯兰与中国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6页。

者。<sup>5</sup>实际上,利玛窦与王岱舆、刘智对待中国文化的心态完全不同。利玛窦以“他者”的目光看待中国文化,在其具体研究中又秉承西方“东方学”的传统,“我们”与“他们”的界限森然分明。“我们”是西方,是“文明”的代表,传播“文明”“福音”是“我们”的“天职”;“他们”是东方,是“野蛮”的代表,“愚昧野蛮”的东方需要接受教化和训导。因此他所抱的是居高临下、教化蛮族异邦的心态,目的是为在中国传播天主教清道,而不是要对话。这也就是杜先生所说的侵略性。而王岱舆和刘智等“回儒”则不同,他们不是以“他者”的目光看待中国文化,没有“我们”与“他们”的界限,心态是一家人中的兄弟看兄弟,目的是要美美与共,和而不同。

总之,“以儒诠经”活动是中国伊斯兰文化研究史上的壮举,建树不凡,意义深远。按照伊斯兰文化的术语说,王岱舆、刘智等人实际上是在从事艰苦的“创制”(al-Ijtihad,伊智提哈德)工作,旨在使伊斯兰教适应一个新的环境。“创制”是伊斯兰文化的重要特征和历史传统,是伊斯兰教的一种自我更新机制。圣训中讲到,创制者得出错误的结论也可得到一份回报,即创制工作的回报;结论正确则有两份回报。既有创制的回报,还有正确结论的回报。可见伊斯兰教特别鼓励创制工作。如何更好地开展创制工作、重启更新机制,使伊斯兰教适应新的时代,与时俱进、不断进取,依然是今天的穆斯林学者面临的重要任务。

“以儒诠经”活动也有不足和缺憾。无论是王岱舆、刘智,还是明清时期的回儒,尽管学通四教,但难免有时代的局限,特别是他们所能搜集到的伊斯兰文化的最新资讯极为有限。从刘智著述中所采辑的书目来看,除了《古兰经》外,其中虽有一些大部头的权威经典著作,但也不乏末流边缘之作,这使得刘智他们不可能了解伊斯兰世界学术发展的全貌和最新动态,也难以对伊斯兰文化诸学科有系统的研究。对于这些局限,我们是不能苛求古人的,而应在他们开拓出的基础上继续努力,更加全面系统地介绍和研究伊斯兰文化。事实上,在对伊斯兰

文化的译介和研究方面,在对中华文化理解的透彻方面,在将伊斯兰文化与中华文化的融会贯通方面,至今还很少有人能够与王岱舆、刘智等明清回族大儒的气度和建树相匹敌。

进入20世纪,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使得中国学术界劲吹阵阵清新鲜活的空气。伊斯兰文化的研究也因此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王皓然(1848~1919)阿訇首倡革新传统经堂教育,新式伊斯兰学校以及各种介绍伊斯兰文化的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创办,王静斋(1879~1949)、达浦生(1874~1965)、马松亭(1895~1992)、庞士谦(1902~1958)等知名阿訇频繁深入伊斯兰世界腹地作实地的考察,更有马坚(1906~1978)、纳忠(1910~)等一批青年学子远赴埃及求学,了解伊斯兰世界文化发展之大势,并及时向国人予以介绍。这时期我国对伊斯兰文化的译介和研究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涌现出许多杰出的学者,诸如杨仲明(1870~1952)、达浦生、王静斋、哈德成(1888~1943)、马松亭、庞士谦、马坚、纳忠、白寿彝(1909~2000)等,他们的大量学术活动拓宽了伊斯兰文化研究的领域,提升了研究的层次,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而且,在他们学术活动中,还始终贯穿着赤热的爱国精神,洋溢着浓郁的国民意识和文化自觉意识,体现出复兴包括回回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的强烈使命感和责任感。

还应当指出的是,这时期伊斯兰文化研究的学术队伍得以壮大,除了回族学者继承传统,继续致力于这项事业之外,一些汉族学者也开始关注乃至亲自参与到有关领域的研究当中,而且颇有建树,如汉族学者铁铮由日文转译的《可兰经》于1927年由北平中华书局出版,首开我国《古兰经》汉语通译之先河;陈汉章(1874~)、陈垣(1880~1971)先生则开拓出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史的新领域;顾颉刚(1893~1980)先生曾在《大公报》(1937年3月7日)发“星期论文”《回教的文化运动》,对伊斯兰文化的研究予以特别关注,他还提出在中国大学开设中国回教史课程、组建“回教文化研究中心”的倡议(第7卷第四期),并在他和谭其骥(1911~)先生主办的《禹贡》杂志上发表了大量介绍和研究伊斯兰文化的文章,先后推出《回教与回族专号》及《回教专号》两期专刊,推动有关研究的进一步

杜维明:“回儒对话的哲学涵义:以王岱舆和刘智为例”,这是杜先生在2005年11月18日在银川召开的“文明对话与文化自觉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主题演讲。这里的引述系根据笔者所记笔录,若有不当,尚请杜先生雅正。

开展。纳忠的《回教与阿拉伯文明序目》(第7卷第10期)、白寿彝的《从怛逻斯战役说到伊斯兰教之最早的华文记录》(第5卷第11期)、赵振武的《三十年来之中国回教文化概况》(第5卷第11期)、庞士谦的《中国回教寺院教育之沿革及课本》(第5卷第11期)等都是发表在《禹贡》上的颇有开创性和影响力的成果。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中,我国学界对伊斯兰文化的研究有了长足发展,在多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除了马坚、白寿彝、纳忠等学界前辈继续开拓创新,并有出色成绩之外,更有不少学术新人不断涌现,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宽,涉及宗教、哲学、语言、文学、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等各个领域,许多方面都有突破性的成绩,学者众多,著述颇丰。

## 二

对我国开展伊斯兰文化研究的学术历程作简要回顾,目的不仅是为了说明我国关于伊斯兰文化研究的历史长久,成绩突出,更是为了彰往知今,述往事以思来者,以便在继承历史传统的基础上,更好地推进未来的研究。尽管我国对伊斯兰文化的研究历史长,成绩大,但从总体上看,现状并不容乐观,基础仍然比较薄弱,研究范围也很不全面,而且至今没有形成完备的学科体系,与我国对世界其他文化如欧美文化、俄罗斯文化、日本文化等的研究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不但有不少盲点空白,甚至还有一些问题和误区。

首先,学术界对伊斯兰文化普遍比较陌生,不知其详,甚至有不少偏见和误解。对于从古到今的西方历史文化名人,即便是中学生,也能说出长长一串人名来,例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但丁、培根、笛卡尔、莎士比亚、卢梭、康德、歌德、黑格尔、罗素、尼采、弗洛伊德等等,这些名人在中国学术界都是如雷贯耳,甚至耳熟能详的。而对伊斯兰文化名人,不要说中学生,就是学术界非专业的一般学者,怕也是说不出几人的名字,更遑论他们有什么代表著作和重要思想建树。诸如艾布·哈尼法、沙斐仪、贾希兹、肯迪、泰伯里、艾什阿里、法拉比、穆泰奈比、比鲁尼、马斯欧迪、伊本·西那、安萨里、伊本·图菲利、伊本·鲁世德、法赫鲁丁·拉齐、伊本·阿拉比、伊本·赫勒顿、伊本·泰米叶、哲拉鲁丁·苏尤蒂等等,这

些人的思想和著作,至今仍是学术界所陌生的名字,而他们中的许多人实际上是古代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文化遗产的真正继承者和发扬光大者,也是文艺复兴以来许多西方学术大师的先师,在人类思想史上有过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卓越建树。无知导致偏见和误解,对伊斯兰文化的普遍误解和偏见,显然与对这种文化的生疏有直接关系。

其次,在具体研究中存在自觉不自觉的步西方后尘的现象,大量引述西方人加工过的资料,较少获取第一手资料,甚至以西方学者的视角看待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历史文化。在研究我们的西邻、近邻时,往往绕道西方,在采用“中东”、“原教旨主义”、“圣战”等大量西方语境中解读伊斯兰世界历史文化的概念术语的同时,也不由自主地造成自我立场的错位,使我们的西邻似乎真的成为我们的“中东”了,以致难以发出中国学者自己的独特声音。“我们究竟如何看待第三世界国家(包括阿拉伯国家)及其文化?是西方人怎么看,我们也跟着他们的视角看,还是我们自己认真地去看看明白?其实,绝大多数的中国学者愿意通过自己的研究提出自己的看法,但苦于不懂第三世界国家语言,只好顺着西方的视角去看,因为他们只能借助翻译过来的材料,即便他们懂英文或其他西文,也只能靠英文和西文材料,而这些材料是经过西方记者和学者精心选择过的,是为他们的西方利益和西方立场服务的,久而久之,我们的这类学者在不知不觉中就接受了西方的立场和观点。然而,西方看待东方、看待第三世界国家往往用的是‘他者’的眼光,把非西方看成是愚昧落后、专制腐败的民族。这样的立场我们岂能苟同?我们自己就是这样被西方看待的,难道我们也这样看待那些和我们同是难兄难弟的第三世界国家?可是那些被西方立场同化了的学者意识不到这一点,反而觉得自己站在了国际研究的前沿,因为他们已经了解了西方的观点而且他们认为西方人的观点是正确的”<sup>6</sup>。

这种现状,显然与我国以往研究伊斯兰文化的漫长历史和业已取得的卓著成绩不相符,也与伊斯兰文化本身在世界上占有的重要位置以及我国作为一个泱泱文化大国的国际学术地位不相称。要改变这种现状,就必须打破各种陈腐观念,跳出“言必

林丰民:《神秘面纱后面的真实》,载《读书》2003年第11期,第8页。

称西方”的学术窠臼，解放思想、努力创新，多方参与、广泛合作，构建起新的学科体系。值得庆幸的是，关于伊斯兰文化的研究愈来愈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例如，作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之一的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就长期致力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研究，近年来更为推进学科建设制定出一系列具体规划，开展了一些重大项目的研究工作，在翻译一批重要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经典文献便是其中之一。该所所长朱威烈教授等更是为建立中国特色的“中东学”、“东方学”、“阿拉伯学”和“伊斯兰学”而孜孜追求，不懈努力，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语学院的“阿拉伯学”也被列入上海市重点学科而受到重视。我们有理由相信，尽管存在人才少、资料缺、问题多、难度大等各种困难，但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文化研究体系的建立将不再是遥远的梦想，因为，对伊斯兰文化的全面研究，绝不会是一个励精图治、涵容万象的文化大国所能长期忽视的。

### 三

关于上述学科建设问题，在拙著《伊斯兰文化巡礼》（2002年6月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导言”部分曾有较详论述，这里不赘述。《伊斯兰文化散论》可视为《伊斯兰文化巡礼》的姊妹篇。回想《巡礼》出版之际，正遇费孝通先生来西北民族大学视察讲学，费老在浏览样稿之后，欣然挥毫，为《巡礼》题签，那种提携后学、激励学术的热情令人感念不忘。费老已于2005年4月24日作古，在《巡礼》姊妹篇出版之际，也谨以此文表达对费老的缅怀铭念之情。

《散论》选录了近年来的一些文章，或引述大家之高论，或略陈一己之浅见，或作宏观的纵览，或有微观的解析，或是最新国际学术成果的译介，或是对某一方面的拾遗补缺，虽够不上全面系统，但也是点面结合，言之有物，持之有据。全书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伊斯兰典籍”。伊斯兰文化的典籍文献浩如烟海，但最重要者莫过于《古兰经》和圣训，对《古兰经》和圣训的研究很早就形成了“古兰学”和“圣训学”两门独特的学科。《古兰经》和圣训是伊斯兰文化的原典，也是伊斯兰文化不断发展演进的思想源泉，对伊斯兰文化诸学科都有深远影响，我国对古兰学和圣训学的研究还很欠缺，这部分选录的几篇都是关于《古兰经》和圣训方面

的文章。

第二部分是“伊斯兰文化与文明对话”，收入6篇相关的文章。关于“文明对话”和“文明冲突”的讨论，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学术界最热门的话题之一。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在1993年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认为冷战后的国际冲突主要是“文明的冲突”，在这场冲突中，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对西方文明构成严重威胁，是最有可能导致世界冲突的因素。除了“文明冲突论”之外，还有所谓“伊斯兰威胁论”、“中国威胁论”、“绿祸论”、“黄祸论”、“新殖民论”、“新帝国论”等各种论调也甚嚣尘上。所有这些都与美国谋求全球单极霸权、遏制异己文明复兴的政治动机密切相关。众所周知，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人类文明是多种多样的，不同文明多元共存、相互吸收、相互影响，才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常态。倡导“文明对话”是伊斯兰文明的人文特征和历史传统。“文明冲突论”、“新帝国论”等奇谈怪论引起世界舆论的强烈不满，特别是伊斯兰世界和中国的学者们纷纷著文予以批驳，强调伊斯兰文化与中华文化均主张和平宽容、追求中正和谐的精神实质，倡导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努力推动不同文明间的相互对话与交流。

第三部分是“伊斯兰文化与中国穆斯林”。研习伊斯兰文化是中国穆斯林的重要学术传统，不但历史悠久，而且卓有建树。中国穆斯林各族人民为促进中华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相互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这部分收录有关文章6篇，其中两篇译文。借此映出国外学者对中伊文化交流研究的关注和取得的最新成绩。

第四部分是“东方学”与伊斯兰文化研究。西方传统的“东方学”是一个庞大的学术体系，研究对象包括中国、伊斯兰世界在内的整个东方世界的历史文化，其实质是为殖民主义服务，当代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伊斯兰研究也承袭了传统东方学的基本立场，直接为西方利益及其地缘政治战略服务。本部分收录的两篇文章，主要讨论了西方“东方学”长期以来对我们的影响以及如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文化研究体系的问题。

第五部分是“伊斯兰文化常识”。它向读者介绍了阿拉伯穆斯林的一些常用名。阿拉伯穆斯林的人名颇有特色，从这些名字中可以看出他们独特的宗

教信仰、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例如“阿卜杜拉”，实际是“阿卜杜·安拉”之连读，意思是“安拉的仆人”，表现出穆斯林对真主的顺从和信仰，真主安拉有99个美名，以“阿卜杜·真主99个美名之一”为结构的人名便是很常见的名字，这样的名字不可省去前部分“阿卜杜”而简称后部分；再如“艾布·某某”，即“某某之父”的意思，“伊本·某某”，即“某某之子”的意思，这种结构也不可省去前部分的“艾布”或“伊本”。由于不了解阿拉伯人名结构而闹出张冠李戴的笑话不在少数，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研究中人名翻译的混乱现象至今还是一个较突出的问题，因此介绍人名实际上还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本书不是对伊斯兰文化全面研究的论著，只是

自己一鳞半爪的学习体会和心得，故名《散论》。本着为我国伊斯兰文化研究添砖加瓦的心意拿来与读者交流，或许连良砖好瓦也够不上。因为其中必有不少差错讹误之处，尚乞识者赐正，抛劣砖意欲引佳玉，期待有更全面、更透彻的伊斯兰文化研究力作问世，是所愿也。

本书出版得到甘肃省重点学科“宗教学”所在单位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宗教研究中心资助，同时，还有赖甘肃人民出版社在各个环节所给予的悉心关怀，在此谨致谢忱。

(责任编辑：马丽蓉 责任校对：杨阳)

•••••

